

中国大革命史丛书

主编 曾宪林

# 中国大革命史论丛

曾宪林 著

2-53

武汉大学出版社

1306.9124

95  
K262-53  
1  
2

中国大革命史丛书·曾宪林主编

# 中国大革命史论丛

曾宪林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C

185707

**(鄂) 新登字 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大革命史论丛/曾宪林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11

ISBN 7-307-00646-4

I. 中…

II. 曾…

III.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中国-丛书

IV. K262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正佳公司激光照排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88 千 印数：1—1000

ISBN 7-307-00646-4/K·43 定价：7.60 元

# 中国大革命史丛书前言

曾 宪 林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的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部分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的革命运动。当时，国共两党和广大群众，都把这一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但1927年国民革命从胜利转向失败以后，这个革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国民的构成也有很大的不同，革命的人民及广大群众，在为挽救革命失败而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中，为弘扬革命正气，把国民革命改称为大革命。从那以后这个中国大革命的称谓一直沿用到现在，并已成为人们用来称呼这一时期革命的习惯用语和专有名词。过去60多年来，大革命这个称谓虽不尽科学和确切，但考虑到人们的习惯，我们这套丛书仍用这个称呼，命名为《中国大革命史丛书》。

中国大革命运动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许多国际、国内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等，很早就开始关注、研究、描写这段历史有关问题。回顾过去近70年来，国内对中国大革命的研究在延续不断地进行着，大致走过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约26年左右为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期间，从大革命时开始，除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等，在许多政治报告、讲话和著述中，论述了中国大革命有关问题以外，我国不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在这段重要历史进行了述论：1926年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所作的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就用较大的篇幅谈到大革命历史；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又在《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文论中，深刻总结了大革命斗争中的教训；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更是认真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这前后，瞿秋白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报告中，论述了大革命斗争历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立三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论著、报告、讲话中，阐述了大革命运动的意义、经验和教训。所有这些，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发挥了指导作用。此外，在中国大革命研究发展史上，开中国大革命史系统研究之先河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华岗，他于1929年撰写了《中国大革命史 1925—1927》一书，后来这部学术著作于1931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大革命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及群众革命运动等作了详尽的论述和分析，歌颂了新民主主义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历史条件的局限，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及当时犯有“左”倾错误的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未能采取分析的态度。但我们不能苛求前辈，应该说这部书仍有其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当时，它为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从那以后的革命战争年代流传甚广，影响和激励过千千万万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也为后来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历史工作者留下了一部重要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将近30年时间，为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和遭到破坏的阶段。这段的前期，即“文化大革命”前，是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时期，当时，最先是叶蠖生、罗仰申发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后来从1956年起，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魏宏运，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上10篇有关武汉国民政府的专题文章；接着湖北党史、革命史学界，在1958年党史调查基础上，由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武汉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所历史研究组的同志们，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撰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革命史资料》（近30万字），其中用了很大篇幅述论了中国共产党和湖北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历史，及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活动和它后来的变质。它虽因各种缘故没有公开出版，但它作为内部书稿发至武汉各大专院校，丰富和推动了大革命历史的教学，并为后来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在武汉仍在深入，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历史组的科研人员，还编写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革命斗争大事记》、《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斗争资料》（草稿），并在《江汉学报》、《历史教学》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有关研究中国大革命史方面的专题论文。这段时间，一是资料上有突破，并进行了整理；二是有系统的著述，并发表了一些专题文章，比建国前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时间里，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事业遭到了破坏，不仅历史被篡改和歪曲了，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历史组，在这段时期资料散失了，人员分散了，机构也被撤销了，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3年的近14年时间里，是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兴旺时期。这一阶段，由于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空前繁荣并成为热门课题。据不完全统计10多年来先后发表了近1000篇论文及大批学术著作、回忆录，大批专题学术资料也相继问世。其中著述较为集中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湖北、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吉林等省市，尤为突出的要算是湖北和北京。这些年来，湖北和武汉的中国革命史、现代史学界除王宗华、郭步云、曾宪林等，参加和主编中南三省协作编撰的《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这一国家“六五”重点课题以外，还陆续出版了刘继增、毛磊、袁继成著的《武汉国民政府史》，张光宇著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曾宪林、谭克

绳、曾成贵、江峡、徐凯希等合作主编和合著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北伐战争史》、《中国大革命史论》、《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此外，曾宪林等和武汉市党史办还编辑和出版了《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斗争资料选编》、《邓演达历史资料》、《五卅运动在武汉》等专题学术资料。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达 400 多篇。对大革命史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论述和评价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讨论也十分热烈，无论在研究的广度、深度，或发表著述之多，学术空气的浓厚等都是空前的：诸如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战略策略，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问题，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性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斗争领导权问题，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迎汪复职问题，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评价问题，郑州会议与徐州会议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共产国际与大革命问题，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瞿秋白、邓演达、蒋介石、冯玉祥等人物活动的评价和分析，都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从而把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并在此基础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联络武汉、广州、上海有关专家、学者，于 1991 年 10 月，成立了以曾宪林为主任，何定华、周景堂、王宗华、郭步云等领导 and 教授为顾问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心，作为深化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

上述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虽然在前进中有过曲折，但总的来说成绩是巨大的，在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对它研究的时间还不长，应该说这些学术问题的探讨仍是初步的，且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有待深入，领域也需要拓宽，特别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尚待加强研究，因此可以说这方面的科研工作还任重道远。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心成立到现在，已经接近 3 年的时间了。这段时间里，我们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

在扎扎实实地工作着，今后当加倍努力，力争全方位地深化中国大革命的研究，培养更多的研究人才，把中心办出成效，办出特点。目前要上的课题不少，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从去年开始在起步编撰一套《中国大革命史丛书》（共10部每部20万字左右）。这是学术性质的著述，是在原来研究基础上，对大革命时期的政权、政党、思潮、文化、教育、经济、工人运动、青妇运动、对外关系等分别进行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这是意欲推动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国大革命史，是中国革命历史链条的重要一环。它的研究能否深化下去，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而特别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及对当代中国革命历史研究关系极大。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更深层次地研究中国大革命斗争历史，弄清大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斗争，阐明新民主主义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背景，搞清楚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和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全面考察中国大革命历史的兴起、特点、发展及其胜利和失败，认真地深刻地总结中国大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科学地阐明这些经验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对当时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作用等，有着特殊的意义。形势的发展，需要把这段历史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这套丛书就是适应这样的客观要求，按照这些年来深化大革命史研究中提出来的新课题，从更宽的视野，更高的高度，去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一般说来，曲高必然和寡，是学术专著就不容易普及，这就是说，阳春白雪要耐得住寂寞，既是学术论著就较难畅销。我没有过高的奢望，只要求丛书的出版能科学地从各个不同角度的专题著述中，阐明中国大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打倒列强除军阀；为什么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一定要建立统一战线；为什么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努力就没有中国大革命；为什么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对大革命的参与，能使大

革命运动具有轰轰烈烈特点；以及如何正确地评价这一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大革命精神。总之丛书的出版，能够较好地起到激励人们投入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及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或起到历史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有助于提高人民的觉悟，去寻找和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就非常满足了。当然，我们也祈望《丛书》的出版，能在国内国际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即中国国民革命史）方面，起到交流作用。

上述这些要求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达到的。为此，我们研究每一个课题，都必须经过严肃认真的探讨、思考；每一部著作都要下苦功夫，认真钻研，才能成功。无疑这是创造性的劳动，是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是心血的结晶。

史学的基础在于史实，大革命史的研究更应该是这样。因此，《丛书》的撰写必须从占有资料入手，但又不能止于资料。占有史料，搞清史实是研究与撰写大革命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除此以外，还要有坚实的理论功底，要有哲学的思辨，要经过扎实的研究。这就要求所有参加撰稿和创作的科研人员，既要加强理论素养，又要在业务上有过硬本领，而且还要吃苦耐劳。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要甘于寂寞，要从热闹场中跳出来，走进资料室、图书馆、档案馆默默去耕耘；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时代高峰，去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这样才能提高《丛书》的质量，拿出高档次的科研成果献给人民，献给历史研究事业。

1994年2月下旬于武汉东湖之滨

## 目 录

|                                          |       |
|------------------------------------------|-------|
| 中国大革命史丛书前言·····                          | (1)   |
| 略论五四运动与第一次大革命·····                       | (1)   |
| 毛泽东与文化书社·····                            | (8)   |
|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大革命前夕在武汉·····                 | (15)  |
| 大革命前期的武汉工人运动·····                        | (27)  |
| 大革命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br>和实践·····      | (33)  |
| 二七大罢工在武汉·····                            | (43)  |
| 二七斗争的革命精神·····                           | (51)  |
| 略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关的几个问题·····                    | (57)  |
| 试论二十年代初孙中山的两次北伐·····                     | (67)  |
| 汉口“六·一一”惨案发生后湖北和武汉人民的斗争·····             | (78)  |
| 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同志在武汉·····                       | (89)  |
| 读刘少奇《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 (96)  |
| 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                      | (103) |
| 国共合作与工农群众支援北伐·····                       | (106) |
| 简论北伐战争的江西战场·····                         | (114) |
| 也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及其在党的中央机关<br>占统治地位的问题····· | (136) |
| 关于武汉国民政府的两个重要问题·····                     | (149) |
| 八七会议历史意义的再认识·····                        | (157) |

|                                  |       |
|----------------------------------|-------|
| 附录： .....                        | (164) |
| 武汉国民政府史研究述评.....                 | (164) |
| 武汉国民政府大事记述.....                  | (182) |
| 关于编写《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的几点体会 ... | (214) |
| 业，成于恒，精于勤，贵于思.....               | (219) |
| 后记.....                          | (223) |

## 略论五四运动与第一次大革命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sup>①</sup>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个科学论断。这个论断高度地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揭示了五四运动与大革命的内在关系。五四运动已经 70 周年了，社会上和学术界，对五四运动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个问题，已有较多的理解和认识，但对五四运动究竟如何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以及整个大革命运动，却关注得不够，更谈不上深入研究。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 —

研究五卅运动如何继承和发展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可以帮助我们搞清五四运动准备了五卅运动的有关问题。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从这次运动的起因、斗争内容、性质，以及运动的浪潮如何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这次持续 4 个多月之久的、气壮山河的民族解放运动，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英勇无比的革命气概。但这不是偶然的，究其历史的脉络，不仅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密切关系，而且与五四运动也是息息相通的。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自此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在罢工、罢课、罢市为斗争形式的、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城市革命群众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斗争起着主导作用，促使爱国运动的波涛，滚滚向前。当时，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为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又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使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反帝反封建纲领的提出，有力地推动工人阶级的新崛起，及各阶层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二七”大罢工则把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了高潮。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提出的先声，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则进一步发扬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使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逐步深入人心。

尽管“二七”大罢工被军阀镇压后，工人阶级运动处于低潮阶段，但“二七”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京汉铁路工人用头颅和热血所昭示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激励着革命人民踏着先烈的足迹继续前进。“二七”革命斗争的实践，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促使他们觉醒。这时，孙中山先生也从中受到启迪，看到了新的力量的源泉，认识到了过去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解决依靠农工问题，他说：“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sup>②</sup>“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宣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独立，始有可望也”。<sup>③</sup>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依靠工农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加快了国共两党的联合和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复兴和大革命运动的走向高涨。直至1925年5月，各种反抗运动潮流，汇合成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涛，而磅礴于中国大地。这很清楚，五卅运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洪流，是以五四运动所开之先河为源头。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二七大罢工、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五卅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上述从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的重大历史事件，又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水平，较之五四运动有很大的提高，其以热爱祖国为中心内容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在承继和发扬光大。五四运动中的“六三”大罢工，是工人阶级自己发动起来的，自愿参加的政治罢工；斗争中开始打破了行会帮口观念，实行了跨行业跨地区的同盟罢工；有明确的政治要求，包括提出了统一工人运动，建立共同领导机构等。而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有中共上海党组织为司令部，而且这个司令部自始至终领导了运动。上海的工人阶级、学生、市民在党的领导下，更是自觉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五卅惨案前就提出了，要“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作前驱”<sup>④</sup>；血染南京路以后的“三罢”斗争中，工人的罢工步调整齐、目标明确；提出了“我愿为中华民族争自由而死，愿为中华民族争独立而死”<sup>⑤</sup>。如果说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已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那么五卅运动中，则更加显示了工人阶级彻底的爱国精神和无私无畏的战斗勇气。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在五卅运动中得到了升华，并成为1925—1927年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革命精神的升华，主要是通过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觉悟的人的斗争来实现的。比如，五四时期涌现出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领袖人物；党的成立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则更加坚强；随后“二七”斗争又锻炼了项英等工人领袖；在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前后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中，又出现了廖仲恺、李立三、刘少奇等大批有代表性的人物；二月罢工也锻炼出了顾正红、刘华、孙良惠、陶静轩、刘贯之等先进分子和优秀干部。这些都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冶炼，以及五卅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哺育的结果，正是这些人物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同人民群众在一起推动历史车轮前进。

可见，五四运动准备了五卅运动，主要表现为延续和光大了

五四运动，及“二七”反帝反封建精神，从思想的发动上为五卅作了准备，同时，斗争中锻炼和涌现的大批优秀干部，也为五卅运动提供了前提条件。

## 二

探索北伐战争如何进一步发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五四运动也准备了北伐战争，以至整个大革命。

北伐战争，是本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南方革命政府发动的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这一伟大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试图用战争手段夺取全国政权的阶段。但它与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集中表现在五四运动中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与北伐战争中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战斗口号所反映的内在关系上。五四运动时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是爱国救亡的口号，其中当然不可能没有中国近代变法图强的思想影响，但更多的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迪，是植根于导致民族危机加深的军阀政府外交失败的土壤之中，其前提是“五四”前的民主思想的觉醒。北伐战争中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则是爱国求解放的口号，这是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中，关于“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的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的鼓舞，及在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统一，革命可以向北发展，以及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仍残酷压迫中国人民，革命的阶级和群众为寻求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产物。其前提是共产党人在探索中，萌发了新民主主义初步理论，及孙中山制定了三大政策，国民革命已经成为人民现实的使命。上述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斗口号，有着共同的地方，即两者都明确指出了当时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及为完成这些革命

任务所要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前者的“外争”与“内惩”，后者的“打倒”与“推翻”，都是为反帝反封建；而且前者为“争国权”、“除国贼”，曾提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低头”两个信条；后者为“打倒列强”、“除军阀”，郑重宣布过“国民革命必须成功，我们的国家必须独立，我们的人民必须自由，帝国主义的宰割，封建军阀的压迫必须打倒”四个必须实现的目的，两者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但应该指出，这两个战斗口号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意志，当时动员群众的内容和提法也有很大差别。五四运动时，是呐喊“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在北伐战争前，国民党人提出：“中国革命之现势非速定出兵北伐大计不可”；共产党人称谓：“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北伐”。前者标志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的高涨和民主思潮的震荡，后者表现出了满怀希望解放的革命激情。一个是为中国的存亡，一个是希望天亮。两者相比，后者比前者有了巨大的进步和提高。

其次，五卅运动某些斗争特点和经验教训的积累也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五卅运动的特点，是各界人民建立联合战线有组织地进行反帝斗争。这种联合战线和组织形式，在各个城市和各种地方不完全一样，有些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或沪案后援会；有些建立雪耻会，或外交后援会等。这些团体大都由工会、学生会或商会等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联合组建的，因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使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摆脱单枪匹马的局面，并能有效地组织和指挥各地反帝斗争，这就保证了五卅运动既轰轰烈烈、又能统一步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为北伐战争的团结战斗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在斗争中国共两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两党的合作也得到了加强，这也为后来建立更广泛的反帝联合战线，提供了条件。北伐准备时期国共合作提出的战略决策，作战过程中国共两党将领和士兵在一个战壕中战斗等，都与这些有密切关

系，都为北伐战争的进行，在组织上作了准备。

关于五卅运动的教训，从主要方面说：一是没有充分发动农民参加斗争；二是缺乏武力作后盾。这两个教训的认识和总结都有利于北伐战争。前者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北伐战略决策时，提出了以农民为主干的北伐政纲，后者使国民政府重视武装力量的加强，如成立军事委员会，将革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中共中央在《五卅二周年纪念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书中，也提出“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sup>⑥</sup>。这又在军事上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至于在干部问题上为北伐作了准备，就更为明显了。如在国共合作上作了重大贡献，为北伐战争立下丰功伟绩的吴玉章、谭平山、宋庆龄、董必武、许德珩等；在工人运动中成为公认领袖的李立三、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等；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北伐反帝反封建而战，在理论上提供科学依据的毛泽东、瞿秋白等；在军事工作中为北伐参与领导或参加战斗工作的邓演达、周恩来、张太雷、张发奎、叶挺、郭沫若等；在党的工作中作过贡献的恽代英、李维汉等，都与五四运动或党的成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五卅运动有关。其中有些在五四运动就参与爱国运动，有些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些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时成长，有些是五卅运动、省港罢工中的新秀。不论他们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战士，还是继承和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积极分子，都为北伐战争及其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人在北伐反帝反封建的各条战线的出现，北伐战争是不可能进行的，更不会随着北伐胜利进军掀起大革命风暴。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都可以从五四爱国运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精神中找到根源。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北伐，除了在思想上、干部上以外，还表现在统战政策和军事上。正是因为这样就使北伐战争具有所向披靡的威力。

在研究和考察了五四运动与大革命的内在关系，以及五四运